

中国散文

理论批评史论

ZHONGGUO SANWEN
LILUN PIPING SHILUN

■ 张恩普 任彦智 马晓红 /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NE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Chido 超视觉工作室
TEL: 1533162717

中国散文

理论批评史论

ZHONGGUO SANWEN
LILUN PIPING SHILUN

ISBN 978-7-5602-5870-6



9 787560 258706 >

定价：26.00 元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国散文理论 批评史论

张恩普 任彦智 马晓红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论/张恩普, 任彦智, 马晓红著.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602 - 5870 - 6

I. 中... II. ①张...②任...③马... III. 散文—文学批评
史—研究—中国 IV. I 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6900 号

责任编辑: 邓江英 封面设计: 宋 超
 责任校对: 李敬东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5687213

传真: 0431-85691969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有限公司印装

长春市长吉公路南线 1 公里处 (邮政编码: 130031)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12.50 字数: 300 千

印数: 001—500 册

定价: 26.00 元

本书系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出版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绪 论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是指先秦散文理论批评的产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散文理论与批评原理及规律的探讨与研究。我国的散文理论批评研究源远流长，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散文理论批评家和散文理论批评著作，构成了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独特体系和繁荣局面，并促进了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产生与发展。

一、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的意义

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实质上就是研究古代文章理论批评史，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的发展历史，也即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研究史。这里的散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指除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所有文章种类，因而，除了那些抒情写景的文学性散文之外，如郭预衡先生所说：“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因为，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家写这类文章，其‘沉思’、‘翰藻’，是不减于抒情写景的。”^① 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

^①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

所确定的文体范围就是如此，按照郭预衡先生的说法是“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因此，所谓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就是对上述这个文体范围之内作家、作品，也就是文章所开展的理论探讨和分析评价，这也是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家所常取的态度和立场。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则是研究和评述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家、散文理论批评著作，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学术思想及研究的发展状况等等。因此，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研究亦是学术史的研究。

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实际是总结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寻其规律，找出问题，总结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发展的经验，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文章及文章写作的各种理论见解和主张，指出其历史地位、贡献及局限性，并以其成果为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提供借鉴与经验，推进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开拓和发展。

第二，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文章写作则承担着发展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诚如刘勰所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① 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这样才能全面反映中国文化，扩大和丰富中国文化。

第三，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也有利于指导文章写作实践。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研究，不仅深入揭示了当时的文章写作原理和方法，而且带有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和宏观指导性。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写作情形不同，内容形式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其中的

^① 刘勰. 文心雕龙·序志.

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却是古今一理。因此，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不仅可以为当代文章写作活动提供借鉴之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文章写作活动提供权威性指导，促进文章写作的发展，提高文章写作的水平。

第四，研究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也可为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中的绝大多数理论家和理论著述同时也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对象。因此，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发展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其中许多资料及研究成果都是通用的。

二、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与古代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古代散文理论批评是在古代思想文化的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先秦两汉时期，处于产生与发展阶段的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基本上都是与思想文化著作融合在一起的，往往是在论述哲学、伦理问题时涉及文章写作的问题，这种模式使得哲学、伦理观点对文章写作思想产生直接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对散文理论批评的阐述从哲学文化著作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大量的散文理论批评专著，但由于文章写作本身就属于思想文化现象，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同样直接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另一方面，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或史学家，他们的哲学文化思想必然直接影响散文理论批评。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因此他把文章写作作为“行有余力”之后的事。王充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他要求文章要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韩愈作为政

治家、思想家，他则要求“文以载道”。此外，古代思想文化也要借助文章写作进行传播，并发挥其社会作用。古人之所以重视文章写作，其主要原因是可以通过文章写作来教化天下。《易·贲卦·彖辞》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以化成天下也。”这就是说，圣人要通过文章来教化天下，正因为此，古人十分重视文章及文章写作。《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将“文”作为其教学内容四个方面之首，可见其对“文”的重视。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对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

儒家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正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因而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也就成了儒家思想的宗旨。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关于“仁”，孔子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从思想修养上要“爱人”，《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是要求做人首先要学会爱他人。从人生目标上要“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要求人生的目标要“克己复礼”，把“礼”作为实现“仁”的最佳途径。从日常行为上要诚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云：“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要求人的行为要符合诚实尊敬的要求。从语言表达上要“讷”，即迟缓而谨慎，《论语·颜渊》云：“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这是要求人的语言表达要经过深思熟虑，谨慎精当。孔子关于仁的解释体现了其思想的主体是“礼乐”、“仁义”、“忠恕”，这些思想亦成为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云：儒家“助人君、顺阴阳、

明教化者也。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思想虽然没有登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正统之位，却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思想的重要来源，某些时候，虽然不是正统，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对古代学者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道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因而老子的思想和学说也就成了道家思想的主旨。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关于“道”，老子亦从四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是“道”的形态。“道”虽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但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依然不知道“道”的形态如何，他对“道”的描述是这样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如果从物的角度来看“道”，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道”，但看不清楚，不过“道”确实是一种存在，而且它有它自己的精神体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指事物内在的客观规律。其二是“道”的作用。在老子看来，“道”是“先天地生”的某种物，即在客观事物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而它对客观事物具有派生作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由此看来，“道”是一切客观事物产生之源。其三是“道”的运动方式。老子认为“道”的基本运动方式就是“反”，“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所谓“反”，即与对立方相反，老子认为“道”是无，而物是有，“有生于无”，“有”的对立方是“无”，因而，“道”是以“无”的形态运动的，我们要通过“有”去探讨“无”，这就需要“反”。其四是“道”的行为模式。老子认为“道”的行为模式就是“自然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是不加人工的自然状态，引申为自由自在，无所凭借，无拘无束；“无为”亦是让事物自由发展，不要人为控制。老子关于“道”的这些解释，成为道家学派的基本思想体系。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

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佛家思想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流派。佛教的创始人是印度的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印度佛教大约是在东汉初年传入我国，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其间近一千年的时间，佛教对中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对宋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也继续产生影响。佛教传入中国，虽然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一直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融合发展，逐渐发展成中国佛教。关于这一点，任继愈指出：“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已有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应该不会被‘误解’了，但是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① 佛教思想主张生活的本质由“生、老、病、死”四苦组成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解脱这“四苦”，达到完全无为、静止的涅槃的境界，提出关于生物转世轮回的教义，如善业超过恶业就保证好的转世，鼓励人们积德行善。

以上三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常常以融合的方式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这种融合并非指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融合，合而为一，而是指在后来的思想文化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无论是在社会的思想体系中还是在个人的思想构成中都同时存在，并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作用。这三种思想的对立性和互补性，有力地调整社会乃至个人向着和谐和奋进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三种思想的融合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演进。

^①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19.

三、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相互联系的方面看，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很大的重合性。首先，研究对象的重合性。一方面，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研究的散文理论批评著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要研究的著作，这种情况从先秦到明清，乃至近代都有重合。如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孟子》、《五经》、《荀子》，道家经典著作《老子》、《庄子》等，汉代的《淮南子》、《礼记·乐记》、《论衡》等，魏晋南北朝的《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唐代的《诗式》、《诗品》等，宋代的《沧浪诗话》，明代的《童心说》，清代的《董斋诗话》、《原诗》以及近代的《艺概》等，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要具体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要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研究的批评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要研究的批评家，比较典型的如司马迁、扬雄、王充、曹丕、陆机、刘勰、钟嵘、韩愈、柳宗元、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夫之、刘熙载等。其次，研究范围的重合性。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围都是从先秦时期到近代，其间均以每一朝代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而且，历史分期也十分相近，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的历史分期为：先秦——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萌芽与起步，秦汉——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继承与发展，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成熟与确立，隋唐宋元——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深入与拓展，明清近代——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繁荣与转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大体如此，如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的历史分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先秦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成熟——汉魏六朝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唐宋金元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和鼎盛——明清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西方文艺

美学的交汇——近代时期。再次，研究方法的重合性。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均采用史的研究法与理论研究法开展研究。史的研究法主要研究各自的历史发展演进，这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较为成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世，到目前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群。而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理论研究方面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走在前面，如由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系列著作已经出版了三部著作：《原人论》、《范畴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研究方面目前还很少。

从相互区别的方面看，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又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是研究的角度不同。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是从汉语文章的角度开展研究的。汉语文章是一切由汉字书写出来的文字作品，这是古人认识汉语文章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汉语文章成为古人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中国古代并没有“五四”时期引进的西方的“文学”概念，所以，古代的文章概念是泛指一切文字作品的，其中既有今天之所谓文学作品，如诗、赋、词、曲、散文、小说、戏曲等，也有公文、政论文、礼仪文等非文学作品，即便六朝时有了“文笔”之分，其中的文也包括部分礼仪文，并非纯正的文学作品。所以，古人研究的“文”或“文章”要比文学作品的范围大得多，是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字作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其“论文叙笔”部分论及文体三十三种，其中大部分不是文学作品，其“剖情析采”部分，所论也基本上是写作方法。即便大量的“诗论”其大部分也是从写作方法上加以阐述，依然属于文章写作的研究范畴。这种情况从先秦至明清，乃至近代，都是如此。这一点，郭预衡先生已经看出来，所以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中，即采用“汉语文章”的角度，而不是“文学概论”的角度，他说：“写这部中国散文史，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①当然，为了与现实

^① 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

的学术研究相联系，我们也依照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的惯例，将诗与后起的戏剧与小说放在研究视野之外。

其次是研究对象的差异。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史在选取研究对象上会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所差异，尽量选择散文理论批评方面的理论家和著作进行研究，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李德裕的《文章论》、陈骙的《文则》、陈绎曾的《文说》、宋濂及其《文原》、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吴讷的《文章辨体》、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刘大槐的《论文偶记》等，这些理论家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一般很少提及。对于诗、赋、词、曲、戏剧、小说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少选或不选。

四、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发展阶段

散文理论批评是人们对文章及文章写作本质及规律的认识，探讨和研究散文理论批评，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章写作能力和文章写作质量，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散文理论批评的探讨和研究。纵观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从总体上划分四个阶段。

（一）萌芽起步阶段（先秦）

先秦时期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时段概念，可以说是从秦以前的战国末期至远古，然而，就散文理论批评来看，虽然在殷周之前必然会有一个语言文字的产生过程，亦产生了口头或书面的文章写作，但由于无法确考而很难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只有从有据可查的殷周时期的文章写作及文章理论批评开展研究，也就是把殷周至战国末期看做我国散文理论批评研究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散文理论批评处于萌芽和起步。这一阶段有两部书值得注意，就是《周易》和《尚书》。严格地说，这两部书都不是专门谈散文理论批评的，但书中已经包含了文章写作思想萌芽。《周易》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其中不乏文章写作的思想，如天地人合一，人为天地之心的思想，对后代的散文理论批评有着深广的影响。《周易》

中关于各种文体的表述成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源头。《周易》中关于“言”、“意”的阐述，已经涉及到了文章构成的研究了。《尚书·毕命》中有“辞尚体要，不惟好异”之说，提出了对文章辞语表达的具体要求。这一阶段亦有两个学派的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散文理论批评研究的产生。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其学科门类四科中就有“文学”一科，这里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同，它指的文章学术，也就是文章之学。而且，在孔子的言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有关文章写作研究方面的论述，比如关于“文”与“质”的探讨，就起源于那个时代，孔子就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关于文章写作的思想并不专门，只是在他关于“道”思想阐述中涉及文章写作问题，如虚静问题、语言表达问题、文章批评问题等。总起来看，这一阶段儒家的散文理论批评思想更具体和专门，其他文章写作思想的阐述则不够专门，标志着这一时期文章写作研究还处于萌芽起步阶段。

（二）继承发展阶段（秦汉）

秦代由于统治时间短，只有十六年，加上秦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并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暴行，使得秦代的文章写作乏善可陈，散文理论批评也就更谈不上。

两汉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研究较前期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是在继承先秦时期散文理论批评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生的。两汉时期有一大批文人涉足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如刘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刘歆、桓谭、班固、王逸、王充、刘玄等。这些人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散文理论批评家，而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等，但已经开始了比较专门的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安、司马迁、扬雄、王充等。刘安具体论述了“情”与“文”、“文”与“质”的关系，涉及到了文章的具体构成问题。司马迁阐述了“发愤著书”和“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表明了他研究散文理论批评的自觉意识。《礼记·乐记》中阐述了比较全面的散文理论批评思想。扬雄的散文理论批评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章写作思想。王充在其著作《论衡》的《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超奇篇》、《佚文篇》、

《自纪篇》多方面地阐述了他的文章写作思想。总之，秦汉时期散文理论批评具有继承与发展的特色。

（三）成熟确立阶段（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也是散文理论批评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散文理论批评家和散文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陆机和他的《文赋》，挚虞和他的《文章流别论》，李充和他的《翰林论》，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颜之推和他的《颜氏家训·文章》等。其中尤以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专门阐述散文理论批评的著作，而陆机、挚虞和刘勰也成为专门的散文理论批评家。陆机的《文赋》以赋体的形式描述了文章写作的全过程及其相关的散文理论批评思想；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论》是完备的文章选集体系；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散文理论批评思想，建构了十分完备的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说影响至今，我们今天文章写作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和文体理论体系，大体在《文心雕龙》中已经具备了。这一时期专门的散文理论批评家和散文理论批评著作的形成，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已经进入成熟确立阶段。

（四）深入拓展阶段（隋唐宋元）

隋代历史短暂，共历二十九年，其文章写作及散文理论批评研究成果寥寥，只有王通《中说》一书中涉及部分关于文章写作的内容，其价值也不是很大。

唐宋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开始向深入拓展方向发展。此时的散文理论批评侧重在方法论的研究上，如立意、选材、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如刘知己的《史通》、柳冕的《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李德裕的《文章论》、杜牧的《答庄充书》、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周敦颐的《通书》、沈括的《梦溪笔谈》。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文章写作的书，如陈骙的《文则》、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吕居仁的《吕氏蒙训》等。

金元时期有三部专门论述文章写作的书是值得--提的，那就是王若

虚的《溇南遗老集》、陈绎曾的《文说》和李耆卿的《文章精义》。这三部书虽然没有建树新的理论体系，但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文章写作中的理论性问题，其“大体须有，定体则无”的思想对文章写作的实质作了深入的概括。

（五）繁荣转型阶段（明清近代）

明清时期的散文理论批评著作则比较多了，可以用繁荣来形容。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如宋濂的《文原》、方以智的《文章薪火》、高奇的《文章一贯》、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李贽的《童心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黄宗羲的《论文管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此外也还有大量的散文理论批评思想散见于书信或其他子集之中。

近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则注重文章写作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并且融入了从西方引进的文章写作及文学理论思想，使散文理论批评研究处于转型状态。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散文理论批评专著。如刘熙载的《艺概》、包世臣的《文谱》、唐彪的《读书作文谱》、蒋维乔的《教授法讲义》、来裕恂的《汉文典》、吴增祺的《涵芬楼文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林纾的《春学斋论文》等。也还有一批著名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王国维等，在其子集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散文理论批评方面的思想观点。